

别开生面的中共根据地史研究

——评丸田孝志《革命的礼仪——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

刘世龙

丸田孝志著作^①自问世以来迄今已有五篇书评分见于日本各主要学术期刊^②,此足见其在日本学界所受之关注。

这五篇书评中有三篇(三品、田中、小野寺)在“评”之前即逐章略述本书内容。评者无意重复介绍,但因此书尚未中译,为便于国内读者了解其大概,在此译出要目如下:

序章 问题的所在与本书的课题

第一部 时间与纪念日

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的纪念日活动与新历、农历的时间

第二章 华北傀儡政权的纪念日活动与民俗利用——以山西省为中心

第三章 晋冀鲁豫边区的纪念日活动与新历、农历的时间

第二部 象征与礼仪

第四章 日中战争、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象征——国旗与领袖像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权力与毛泽东像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追悼仪式与土地改革时期的民俗

第三部 组织与动员

第七章 日中战争、国共内战期间冀鲁豫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第八章 国共内战期间冀鲁豫区的大众动员与政治等级划分

终章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

由上述要目可知本书内容安排匀称,在序章提出问题,以三部曲为主体,于终章阐述其写作用意。

序章开门见山,提出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根据地,政治权力如何利用时间、象征、民俗及其相关信仰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

① 丸田孝志『革命的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

② 这五篇书评除荒武達朗「民衆の心性という角度から読み解く中共革命:丸田孝志著『革命的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東方』第395号、2014年1月)外均直接以被评书名为题,其余四篇为三品英宪于『史学研究』(第285号、2014年9月)、田中仁于『现代中国』(第88号、2014年)、小野寺史郎于『歴史学研究』(第927号、2015年1月)、卫藤安奈于『中国研究月報』(第69卷3号、2015年3月)上发表。

工作。这一问题此前在中共根据地史研究上相对不受重视而缺乏充分讨论。此书是评者所见该领域内首本专著,堪称别开生面之作。此书为作者整理增补先前所发论文而成,其最早者可溯至1998年,从视角的新颖性及其所用史料而言,可谓学界之率先。^①关于其内容特征,为此前五篇书评所述及者大致有四。一是本书主要依据较档案更易入手的当时近30种(含中共根据地内发行的10余种)报刊等常见史料。二是以中共三大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太行太岳区、冀鲁豫区)为中心考察其异同。三是从民众心性和民俗实态来阐释中共的农村革命。四是揭示了当时在民俗利用战略和象征操作上中共政权与国民政府及华北日本傀儡政权之迥异,即前者以革命为目标但后者则以秩序建设、社会整合为目标的本质性差别。

除上述特征外,五篇书评还指出此书其他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认为此书融合了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写作手法将中共研究推上了新阶段,其贡献并不限于史学领域,对民俗学及现代文学研究亦有所推进。

对于这五篇书评所举本书优点评者基本赞同。但是,这五篇书评亦针对此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于此评者也想述录所感如下,以就教于著者、读者和上列评者。

本书第一部中很能引起评者关注的是其比较研究。例如第二章及第三章第一节就围绕纪念日活动与民俗利用这一问题,不但比较了华北日本傀儡政权与伪满洲国、国民政府的相关情形,而且与中共根据地进行了对比。这看似对主题有所越界,实则与第一章中将中共政权的时间运作定位于中华民国的时间政治框架之下有逻辑相关。作者认为中共与其他抗日统战势力同处抗日前线,亟须尽快明示拥护国民政府的姿态,因此中共晋东南根据地(后发展为太行太岳区)比陕甘宁边区更为重视国民政府系统的纪念日活动,也更早利用传统节日进行宣传动员。不过,评者认为还应看到中共的表态也有利于其领导下各民众团体的建立和扩大。典型事例如自1939年元旦中华民国纪念日召开的“拥蒋大会”,期间建立了各界救国总会筹备会,会后顺势成立了工会、妇女、农会和青年的晋东南总会。^②

著者认为中共对民俗时间的利用与华北傀儡政权虽有共性,即选取传统节日进行军事作战、动员、训练或征兵等活动,但更多的则是趋异。沦陷区因1942年开始的统制经济和治安强化运动,导致集市被限制,集会与宣传的机会随之遽减,也几乎没有像中共那样关注传统节日和节气,这表明日伪“权力未能渗透到农村基层社会”。^③山西省内的中共根据地则在1941年就为打破经济封锁而恢复集市,并在宣传工作中对秧歌队等民间文艺形式大加利用。与中共在宣传动员时兼顾民众企求“发财”和子孙繁荣的心性相比,华北傀儡政权更为提倡统治者的道德规范。但是,中共未对日本及其傀儡政权积极利用的佛教节日加以关注,这一点在后来的国共内战时期更为积极利用民俗时亦然。评者认为这种情形也与中共同国民政府合作积极动员僧众抗日(例如周恩来“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南岳题词和晋察冀边区八路军里的五台山“僧人连”等^④)形成反差。何以如此呢?作者虽已点出是由于中共对“己方意识形态的对立物”一贯予以排除,但评者感到尚可开掘史料再作探讨。

① 九田有三篇论文曾被译为中文:《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和象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合编:《“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版)和《内战时期冀鲁豫区的群众动员和政治等级》(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 2010-7.)。

②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 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128页。

③ 九田孝志《革命の儀礼》,99页。

④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85—387页;王志斌:《战争与佛教徒——对五台山佛教徒抗战的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8年,第31页。

此书的比较研究,启发评者想到与民众心性多少有所关联的地域文化因素。此书既已对中共各根据地如何利用民俗做了很好的比较研究,似乎也可嵌入分析其与各地民性互动的内容。事实上中共对因地制宜的民性是有所体认的。1938年3月20日中共冀豫晋省委报告中就指出:“河北民性强悍,山西民性温和易于统治,但同为农民性质,如果领导不好,或缺乏领导,极易走上土匪主义的道路。”^①这种将“民性”与“农民”及“土匪主义”相联系的“基本认识”从何而来呢?虽不必推断是源自县志等相关记载,但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于1937年10月,此时其对当地已有约半年的体察,加之前此多年阎锡山所谓山西模范省的建设,判言山西民性有别于河北应有其理,而这种认识也对其发动、领导农民或有指导意义。故各根据地不同民性对中共的动员工作有何影响,也值得探讨。

第二部以文本和图像为依据,就中华民国国旗、国共领导人像,特别是毛泽东像的使用,以及其所牵涉的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个人崇拜与民众心性的关系等问题做了翔实有力而生动精彩的阐释。书中以表格的形式归纳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各根据地对中华民国国旗和领袖像的使用特点。其间国旗和国共两党领袖像并用或不并用的情况,特别是蒋介石像的使用情况,体现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作者认为中共对国旗的使用“显示出中共政权和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与统一战线和中华民国的框架并不矛盾。但国共关系恶化后,则可以说这样做是在主张只有中共政权才能代表中国正统的民族主义”。^②对这里的“并不矛盾”说,评者认为尚可讨论。这里且作一个必要的补充,即纵然是在国共关系很紧张的1944年,当国军因日军的“大陆打通作战”攻势而大溃败时,延安地区为首次庆祝联合国日暨动员保卫西北而举行了盛大集会。会场上37个联合国成员国(含中国)的国旗飘展,主席台上高悬“联合国领袖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蒋(介石)主席的肖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及边区人民诸领袖的肖像”。会上朱德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发表演说,“要求当局放弃反共反人民的错误立场,实行团结抗战和民主,配合盟邦,准备反攻”。参会群众还高呼“国共两党团结起来,打退敌人的进攻”等口号。^③这些场景表明中共此时仍坚持以中华民族大义为重,继续信守国共合作的承诺。

书中还提到,整风运动开展后,随着毛泽东权威的提升,在中共根据地内使用孙、蒋像的情形减少,而使用毛泽东像的场合愈加增多(从各种会议到农民家庭、人生礼仪等),且将毛像尊奉到高位——不但高于其他人像,甚至高于部分神像。这些论述大大拓展深化了既有的相关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抗战末期到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像在中共根据地(太行太岳区和冀鲁豫区)因地制宜,利用民俗替代神像,普及到农村、机关乃至若干城市最终起到动员群众作用的过程进行了翔实的阐释,并且还从民间信仰的心性结构出发考察了与千年王国论的说明所不同的毛泽东信仰的特征。其中至少有三点颇具启思性。

一是在象征运作上,劳动英雄使用毛泽东像对于提升毛泽东权威进而形成党内的毛泽东崇拜起到了重要作用。书中生动描述了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们将毛泽东奉为“救命恩人”“救星毛圣人”,毛泽东像被赠送给各地英雄,且被人们敬奉家中的故事。由于农民崇拜英雄的传统心理,特别是基层出身的劳动英雄对于农民的亲和性^④,这些言行大大推动了毛泽东像在农村的普及,甚至

①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 群众运动》,第94页。

②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156页。

③ 新华社延安十五日电:《庆祝联合国日,保卫西北,延安四万民众盛大集会》《延安庆祝联合国日捍卫西北动员大会朱副长官发表演说》,《祖国呼声》1944年第6期,第22—25页。

④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和孙万福的口才都很好,被周扬撰文赞誉为“健谈家”,被郭兰英唱响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关键歌词,就源自孙万福这位“不识字劳动诗人”即兴口作。参见周扬《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第4版。

使其逐渐取代既有民间信仰中的神像。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英雄崇拜与毛泽东崇拜的互动共进共益关系。太行区的群英大会闭幕式主席台上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肖像两旁,“并排挂着当选太行区英雄的巨像”^①,加之这些劳动英雄被政治符号化,就座于各种公众集会的主席台上,当选为根据地参议员乃至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等,这些崇高荣誉也成为激发劳动英雄们呼吁民众“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的心理内驱力,进而使英雄群像的示范效应转向毛泽东像的聚焦效应。

二是对毛泽东像的历史图像学解读。本书从大量史料中梳理出5张表格,标示无帽而严肃的正规标准照和戴八角帽笑容亲切的抓拍写真照这两种毛泽东肖像于1944年至1949年间在报纸、邮票等载体和集会、节庆、仪式等场合的使用情形。特别是针对移用了前者的“永远跟着毛主席走”“三年早知道”这两幅在太行区根据地批量印售的新年画,不但分析其在构图、明暗关系上的推陈出新,也分析其对农民心性既规训又顾及的拿捏。除此之外,评者感到还可对此书封面的“永远跟着毛主席走”这幅新年画作进一步分析。其两侧各有7幅小图表现男耕女织场景,底边有5幅绘有家畜家禽的小图,年画下左右两角各有衣物和粮仓的图案等。这既是对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的具象化,也寓意着“永远跟着毛主席走,丰衣足食有奔头”的民众心性。而表情严肃的毛泽东像上“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的标语,与其下“民国三十七年岁次戊子”之间,则构成“民国”与“永远”的话语张力。

三是将“为人民服务”置于毛泽东权威经整风运动而确立的过程中加以分析,考察了这个用语成为毛泽东的表象及其思想的简明表述,并如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一样广泛传播的经纬。此种探讨显示出作者似乎在努力避免政治分析上的“泛符号化”和对文本的过分强调。^② 评者认为,1945年中共七大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且以“为人民服务”为其宗旨,此两者乃一体而两面,但此处不妨追加与国民党“为人民服务”话语的对比分析。早在1927年6月30日颁发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团“第一期军事政治修业”的毕业证书上,就印有“誓为人民服务”六个隶书大字,并且印有孙中山像和国民党党旗、国民革命军军旗及总理遗嘱全文。其图文结合的象征运作手法,与1940年代以降的中共有结构性相似。又如1931年8月28日的“国民政府令”更明确规定“全国官吏为人民服务,应夙夜儆惕,共勤国难”。^③ 国民党“为人民服务”的表述比中共及苏联更早^④,且伴之以军事、行政的威权,但何以难见成效而被中共“后来居上”呢?其要因之一即在于如何把握“为人民服务”的核质。毛泽东1942年12月夸赞劳动英雄吴满有时强调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⑤,可谓洞悉民众心性之语。其后新华社报道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下午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时则明记:“为人民利益服务。”^⑥ 中共在与国民党博弈中胜出的关键,即在其“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尤其是努力做到口惠而实至,才得以将被叹为“一盘散沙”^⑦的民众组织起来,其“为人民服务”的象征运作也才得以顺势在民众

① 本报特写:《群英大会闭幕典礼记》,太行《新华日报太行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战绩展览生产展览联合大会增刊》,1944年12月19日,第1版。

② 洪长泰在所著《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的自序中对新文化史研究中的“泛符号化”和过分强调“文本”现象,都有所批评。

③ 两例分见徐宝来《最早出现“誓为人民服务”字样毕业证书》,《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6期;公文:《中徽官吏案:国民政府令八月二十八日》,《考试院公报》1931年第9期,第1页。

④ 参见刘建军《“为人民服务”的命题史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

⑤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日文版见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八卷、苍苍社、1983年、340页。

⑥ 《追悼张思德同志会上毛主席亲临讲话》,《抗战日报》,1944年9月27日,第3版。

⑦ 九田孝志《革命の儀礼》,235页、注(22)。

动员中“青出于蓝”而大见成效。

本书第三部也是为其副题所决定而不可或缺的。此前第一章第三节即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是如何将新历纪念日与农历24节气及传统节日相结合,并且利用春节期间的各种文娱活动和庙会、骡马大会等仪式场面的聚众效应而进行政治动员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其内容则聚焦冀鲁豫区,分别从“内”“外”两个角度考察该根据地中共地方组织的实态及其在国共内战时期的大众动员与政治等级划分。文中认为通过整风运动、整党运动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到内战末期,组织整顿的压力到达了村一级”,其“组织力渐次强化”。^①这使评者感到中共军队中“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有被推行到“支部建在村上”的趋向。

另一方面,此书以新颖的视角分析了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时期的大众动员手法,认为在前线根据地不安定的情势下,阶级范畴已不够用,于是有党员、英雄、模范、农会会员、开明士绅、恶霸、地痞流氓、汉奸、民族叛徒等“孕育着许多暧昧和恣意”的“政治等级划分”。^②而中共则因应内战时期形势的变化“反复伸缩其打倒之敌或同盟者的范围,对政治等级的划分也随之改变”,但“在严格区分之中,容许一定的流动性,从而维持着迫使人人忠诚的特征”。^③

此书在上述考察中对历史连续性有诸多揭示,选而言之有四。一是给不同政治等级的村民发放并要求佩戴各种标识,而这“与明清时期标示官位等级的补服或勤杂人员和兵卒的制服书有职务名称如出一辙”。^④二是对各种模范的表彰仿行了科举礼仪。被评为“状元”的英雄、模范坐轿骑马游行,被授予匾额、载入“功臣榜”。三是在土改时的大参党运动中采用了历史和现实中既有的会门宣誓方式(盟誓)不断扩大党和群众组织。四是出身血统主义,地主、富农的子女也被视为斗争对象,而这种情况也令人联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此书认为上述政治等级划分和动员手法,为革命后的中国所继承。这启发评者想到为其“所继承”者尚有土改时期派工作团(队、组)进村、建立贫雇农团、“一切权力归农会”等运作方式,这在1963年至1966年5月的“四清运动”中就有结构性再现。^⑤而将两者相比较以见其异同,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评者还想到历史连续性含有上挂下联两个方向。“下联”已有上述。且就“上挂”而言,利用秘密结社盟誓手法的有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所组创的“中华革命党”,而且孙中山本人还曾加入檀香山洪门致公堂,这似可看到后来冀鲁豫区中共组织为争取利用或瓦解会门而采用“打进去”方法的端倪。还有,作为血统主义的表征,革命时代看重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和规定“查三代”也并非没有宗法制上的远因。早在宋代婚书的男家和女家草帖中,就都要填写各自的曾祖、祖、父三代。^⑥若古今对比,可见叠加于既有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之上的阶级性,仍要受到既有身份社会框架的制约。第六章所揭示的土地改革中掌握了村落权力的贫雇农,在与地主的地位相逆转后的礼仪现象也体现了这一制约。如山西曲沃白水村农民邢福相殡葬其母时,为了“从人格上翻身”,命“封建富农”郭子盈“夹着扫帚,拿着枕头(亡人枕),给扫灵烧枕头”,看热闹的人都说“这样才算是穷人真翻透了身”。^⑦这些也正如作者所说,反映了“浸透到根据地民众的权威序列意识”。^⑧

① 九田孝志『革命の儀礼』、267頁。

② 九田孝志『革命の儀礼』、275頁。

③ 九田孝志『革命の儀礼』、296—297頁。

④ 九田孝志『革命の儀礼』、279頁。

⑤ 尹长瑞:《“真像土改时的工作队”——参加“社教”的一点回忆》,《老友》2008年第7期。

⑥ 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前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版,第81页。关于“血统主义”的研究,可参看西条正『『幹部履歷表』にみる中国体制内改革——血統主義の終焉』、加加美光行編『中国内外政治と相互依存』、日本評論社、2008年。

⑦ 敬亭、水屏:《农民自己当先生 斗争对象去扫灵》,太岳《新华日报》,1947年10月9日,第2版。

⑧ 九田孝志『革命の儀礼』、308頁。

学术讨论与回应,不能局限于评者与书评书籍的对话,也应积极尝试与已有书评进行互动。在评者前已提及的三品英宪的书评中,就质疑各个家庭的神(灶神和财神)低于村落和宗族组织祭祀的土地神这种说法,他认为“守护农业”“镇守土地”的土地神,并不能等同于“镇守村落”的神,土地神也被民众用来祈愿各个家庭(而非共同体和地域)的安宁。

三品英宪的质疑有助于深化相关问题的探讨,对此评者亦有四点感受。一是本书所叙中共根据地民众用毛泽东像取代土地神的生动事例已证明土地神确有超越灶神等的公共性。二是土地神的多歧化。既有守护一方的土地神^①,也有家神中的土地神。^② 中国传统年画《家宅六神》中就以土地神与灶神为主位。^③ 三是财神的形象也具体多样。如关羽也被当成财神之一,如此则财神形象在华北地区中共根据地内与关羽形象有何关联也可关注。四是中共根据地民众的毛泽东崇拜并未止步于将毛泽东像取代灶神、财神、土地诸神像,其要因之一是这些神灵属于中共坚决反对的“封建迷信”之列。^④ 虽然民众对毛泽东崇拜的言行比较分散,但评者仍能从此书中看到其由“恩人”“圣人”到“活神仙”“活财神”再到“救星”“北斗星”“紫微星”直至“太阳”的层级升进之一面。并且前三者往往将共产党、八路军与毛泽东并提。^⑤ 而率先将毛泽东比喻为“太阳”者,就是前已提及的孙万福这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报》刊登的“移民歌手”李增正编写的九段歌词中,毛泽东被进而唱诵为“东方红,太阳升”。

除上述特点外,本书虽编制了46张量化处理史料的表格,但仍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正是由于此书的新颖性,评者一年多前在讨论课上就曾遇到如此提问:这是一本属于新文化史研究,或新革命史研究^⑥的书吗?当时评者的回答是很难说。眼下这篇书评走笔于此,仍感到很难说清。这不只是因为此书对于“symbol”“cultural hegemony”等日文音译词敬而远之,也因为此书在既有的中共根据地史、中国革命史视域上,移用了与其说是新文化史,不如说是更有地域史、民国史、20世纪中国史、中日关系史、比较史乃至世界史等特色的视角^⑦,且在各个视角下运用民俗学、图像学和象征研究等手法。评者感到正是这种复式研究所伴生的开放性与启发性,更可接近于历史本来就有的多重面相。

[作者刘世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郭 阳)

①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1卷,第213页,以及该书第5卷,第431页,转引自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28页。

② 此外还有所谓王府官衙土地神、学府土地神、寺观土地神等分类。参见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③ 《家宅六神》(木版年画),王抗生主编:《中国传统艺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关于19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民俗复兴”中“家宅六神”现象的研究,参见滝川麻子「中国河北農村における家神——石家庄市趙県を事例として」、『比較民俗研究』第19号、2003年11月。

④ 反对封建迷信的还有致力于推行“国历”(新历)的国民党势力。参见苍《推行国历首先要打倒灶神和财神》,《宜兴民众》第45期,1930年11月30日。

⑤ 毛泽东早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就已指出“中共与八路军被称为‘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

⑥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例举“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成果时提到了九田的两篇论文。

⑦ 例如作者对“千年王国论”被用于中国史研究进行质疑而得出己见,评者赞同其质疑但感到其所得见解仍需讨论。